

新论集萃

20世纪二十年代中共

“小资”观念的起源

郭若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共历史上,“小资产阶级”问题始终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20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有关“小资”特征与表现的相关论述,历史地形成了一整套“小资”观念。中共“小资”观念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含义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都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下构成的。从观念史方面研究分析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一方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历史,另一方面也可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崔志海在《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刊于《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退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特征

于殿利在《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特征》（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古巴比伦,虽然王室和神庙控制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但私人经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业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纳第图女祭司、商人塔木卡乃至政府官员虽不直接参与土地耕种,但均投入到土地买卖活动中赚取商业利润。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存在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合伙制,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土地的职业管理人。而土地的耕种则采用雇佣劳动,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有明确权责利条款的雇佣合同,工资的支付既可货币也可以是实物,但必须征得雇工的同意。这些均表明,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具有超乎想象的商业化特征。

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刘玉堂、张硕在《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刊于《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等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对编钟制度的研究,使得编钟作为周代后期雅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更加凸显,而乐悬制度、礼乐制度的传承线索亦更趋清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编钟铭文多达 3755 字,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字体篆书的典型。

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

张海林、谷永清在《从“开官智”到“开民智”：论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刊于《东岳论丛》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外时局逼迫及体制内精英的诉求下,清政府通过政策变革、体制调整开辟了由官员现代化到民众现代化的自强之路。“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官员现代化,即所谓“开官智”教育。日俄战争后,随着晚清新政向宪政发展,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继续“开官智”外,还有“开民智”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官智、民智齐头并进的新阶段。开官智、民智的内容也从自然科学知识延展到西方的政治智慧和体制优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近代上海何以成为远东国际汇兑中心

宋佩玉在《近代上海远东国际汇兑中心的形成》（刊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影响一个地区成为国际汇兑中心的主要因素有三:经济规模、金融状况和政治环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正是具备了相当数量的汇兑业务量,一定数量的国际汇兑办理机构、品种齐全的汇兑业务种类、符合国际惯例的汇价体系、外汇管制的全面放开等特殊历史条件,与“远东唯一的金市场”、大条银市场相互套做,形成多角汇兑关系,从而成为远东汇兑市场之中心,在空间和功能上对伦敦、纽约等欧美国际金融中心起到补充作用。

理论·史学

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历史形成

□ 李国强

南海疆域是在中国人民对南海认识以及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历代文献中所记录的南海地名,对我们考察中国南海疆域的历史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从“涨海”、“珊瑚洲”看唐代之前中国人民对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早在公元前 2000 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的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中国人民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緇以铁叶,值之多拔。”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其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十分一致,其中所言“崎头”是我国古人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我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崎头”指南海诸岛的礁滩。从杨孚和万震的记载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初步了解到南海的基本特点。中国早期其他史籍中关于“涨海”的记录频繁出现,可以确定,在古代历史时期以“涨海”泛称南海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采用。当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论,“涨海”主要是指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局部海域,“珊瑚洲”主要指东沙群岛及其海域。

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隋书》记载,公元 607 年,（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其中记载的“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沙群岛。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西沙群岛。

唐代又以“象石”指称西沙群岛。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其所言九州石位于当今海南省文昌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环王国位于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算,“象石”即西沙群岛。在后代,顾炎

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的记载。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汉代,中国人民已经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民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标志着中国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

二、从“石塘”、“长沙”等看宋元明清中国人民对南海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南海诸岛的地名具有以下特点:

1、名称繁多。出现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

2、地名相对集中。基本上采用了石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航线的记载考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同时,出现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群岛。

3、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对南海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南海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不仅对南海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对南海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险地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其载:“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由于当时南海诸岛中沙、南沙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即 Pulo Aor,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中国南海疆域更加清晰。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常性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

元代文献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从 1329 年到 1345 年曾亲赴南海和印

度洋一带的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中明确记述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可以说,元代是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区域由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向南沙群岛延展的过渡期。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南海疆域范围由此也大大延伸。

明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史载、图籍大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绘南海诸岛的地图,当属 1402 年李荟和权近所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中在南海海域分别标绘有“石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我国著名南海史地专家吴凤斌先生的研究,它们分别是今东沙、西沙和中沙、南沙。

至清代,中国人民涉历南海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南海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稳固;南海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区分,南海疆域范围日渐明朗。如成书约在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针对我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航程、地理地势,都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还对不同群岛分别命名。再如,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撰著的《海国闻见录》不仅详细记录了南海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还对南海诸岛四个群岛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的记载,对四个海域进行了清晰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流传于海南民间的《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所记载的地名和航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它是渔民通过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航海指南,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四个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

三、从南海诸岛地名的规范看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疆域范围的确定

晚清至近代以来,一方面继承了历代南海范围的传统疆域观,另一方面着力从地名、地图等层面加以规范,从而使南海诸岛的疆域范围最终以确定。

晚清时期开始统一使用“东沙岛”,1909 年已统一使用“西沙群岛”。1909 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命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甘泉岛附近海域

开埠及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得其流域中心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以至于外人称“闽江的贸易系于福州之手,福州贸易兴,闽江贸易自兴”(东亚同文会编:《清国商业综览》(2),第 347 页)。与此同时,流域各地也出现了地区中心城市,分别扮演着闽江上游三支流及中游地区的地方各类商品集散与转运中的角色。除此之外,近代闽江流域尚有一批因土货外销而兴起的市场,其中一部分是在传统墟市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相当一部分则有别于墟市。它们分布在各地水陆交通便利之处,可直接与地区中心城市和流域中心城市发生联系。

这样,晚清时期的闽江流域实际上已从一个流域变成一个经济区,其特征即是在流域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福州为中心的功能性的层级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区域的发展模式也由此基本定型,即单纯地向国际市场出口农产品及半加工品,同时进口大量近代机制生活消费用品。

二、从发展模式到发展障碍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依靠农业产品积累资金,进而启动产业改良、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先例不胜枚举,从发展模式上看,近代闽江流域似乎是选择了这一路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就资金而言,首先,特产贸易当然可以获得大量资金,但近代闽江流域的特产赢利没有转化为产业改良、升级的资金,原因首先在于经营流域特产贸易的商人多为

近代闽江流域发展模式再思考

□ 水海刚

福州商人和流域外人,因而由贸易带来的财富多数为这些商人所有并转移,产地民众获之甚少。其次,商人资本再投资少,其阻碍因素多来自区域社会环境的约束。总的看来,近代以来的闽省政局更迭频频,使得各地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土匪横行,这给闽江流域新式工业的投资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时人称“新式工业之盛衰,胥视资金之多寡,本期以来,闽省政局多故,投机事业,因鲜保障,遂趋减少”《闽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再次,除了本地资本外,外来资本少也是无法实现产业改良、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外国资本以外,近代闽江流域甚至福建省赖以依靠的外资多为侨资,然而据统计,1871—1949 年福建华侨投资福州户数仅为 30 家,投资额为 6828925 元,仅占全省华侨投资总额的 4.9%,流域其他各地如南平、永安、古田、闽清、福清、德化等地的华侨投资规模则更为弱小,近代以福州为代表的闽江流域对华侨资金的吸引力显然不够。这样,在产业无法改良和升级的情况下,在资源消耗型的土特产品输出贸易衰落后,区域的发展状况也就每况愈下了。

近代闽江流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决定了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换言之,港口及其城市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实是区域发展的关键。然而综观近代福州港,其特征则是“港不兴”,福州港的船只进出口数及货物吞吐量始终处于较小的规模,据调查,20 世纪初的十几年里,福州港进出口的汽船数常年均在 520 余只,载重量只有 50 余万吨。与“港不兴”相对应的是“城不兴”。福州口岸城市及